

□历史回眸

英雄虎胆贯长虹

——追念抗日英雄王延林

李海流

在古薛大地上一直流传着王延林英勇杀敌，抗战牺牲的事迹。热血洒鲁南，肝胆照后人，王延林为抗日救国历尽艰险，身经百战，足迹遍及津浦、临枣铁路沿线，抱犊崮山区，微山湖区及运河两岸，后因汉奸告密，不幸遇难。时至今日，他的英勇事迹在鲁南乡间广为传颂。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追念这位逝去70多年的抗日英雄。

王延林，枣庄市薛城区兴仁村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入私塾读书，家教甚严。父亲王玉泮亦农，农闲时在临城（今薛城）

一街开了一家面坊，靠着家中几亩薄地和面坊维持生计。王延林生性豁达，慷慨好义、乐善好施，村中民众只要有求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鼎力相助。抗战时期，他在临城、兴仁、陶庄、山家林等地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投身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协同主力部队抗击日伪军。

众英豪群起抗日

上前线奋勇杀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全民组织起来抗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时的鲁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王延林在枣庄早期中共党员褚雅青的带领下，与同村族人王玉莲、王延斗、王玉新、李德祥、陈还有、陈延年等人秘密组织抗日自卫军，隶属于董尧卿、董一博创建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团，肩负着抗击日寇、汉奸队、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

1938年3月，日军侵占滕县后，党组织为扩大影响，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包括滕县伪县长周侗、爱国人士孔昭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成立了“滕县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有石，秘书长李树勤。自卫委员会的职责是组织武装抗日，维持地方秩序。4月下旬，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同意董尧卿继续使用“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称号，并任命其为第一支队司令。不久，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了沛县、滕县、峄县等地武装起义，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5月在山亭区西集镇老古泉村成立了“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治委员何一萍、政治部主任王见新，领导和指挥苏北、鲁南各地方武装的抗日工作。此后，董尧卿、董一博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与友军第十军团暂编第六师，编入孔昭同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旅。

按照滕县自卫委员会的战略部署，王延林所在的部队自参加抗战以来，先后在滕县界河、东沙河、临城等地同日伪顽敌交战十余次，每次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毙伤不少敌人，军威大振。1938年3月17日，滕县被日军攻陷，为阻止日军南下临城，18日，王玉莲、王延林带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30余人在临城西仓库与50余人的日军先遣队相遇。王延林指挥部队在蟠龙河畔抢占有利地形，向日军发起攻击。他扒下棉袄，光着脊梁，举起手枪，带领士兵埋伏在蟠龙河北岸伏击日军，一时间杀声震天、枪声乱作一团，双方对峙了半个小时后，敌人得知是鲁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勇气，丢下4具尸体，狼狈向北逃窜。王延林率领众人乘胜追击十余里，敌人吓得魂飞胆丧，溃不成军。

台儿庄大战后，国民党军队南撤，鲁南沦陷，其县、区政府亦随之撤退，滕县、临城、峄县相继陷入敌手，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不久，为充分发挥鲁南抗日自卫队、运河支队、微湖大队、铁道大队等几支队伍的抗战作用，鲁南特委派朱道南、杜季伟、董尧卿、孙伯龙等同志出山，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关系，很快把他们

联合起来，组成了山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简称“山外抗联”，团结一心，共同抗日。

山家林站拔据点 大墙里救慰安妇

1938年秋，董尧卿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下设三个团、一个直属营，分公开和潜伏武装两部分。王延林所在的二团最少时30多人，最多时50多人，分长枪班、短枪班，潜伏在临城敌占区，采取日休夜聚的办法，在临城、兴仁、井亭、山家林、西集等地开展小型、分散的游击战争。

临城位于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的交会处，是抗日队伍的集聚点和主要活动地，日军对此处的安全警戒度特别高，派驻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驻扎在临城火车站和铁路两旁的炮楼里，负责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火车运输煤炭的安全。根据上级指示：“二团同铁道大队配合行动，坚持铁路沿线和微山湖一带的对敌斗争。”期间，王玉莲、王延林多次带领队伍与临城铁道队队长孙茂生、田广瑞、张亮元、王守银的抗日武装联合作战、伏击日军。他们先后参加了临枣线打票车、攻打邹坞乡公所、袭击临城车站、截获日军运布货车以及除霸灭奸等战斗。据铁道游击队老队员马世田回忆，在战斗中，王延林有胆有谋，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袭击敌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屡建奇功。

1939年7月，罗荣桓带领八路军一一五师分批挺进鲁南，驻扎在抱犊崮山区，领导鲁南的抗日工作。自从一一五师进驻鲁南后，地方武装相继得到正规建制和番号。1940年1月，王延林所在的队伍正式列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大队鲁南支队（以下简称鲁南支队）。

1940年，鲁南各地方武装不断加强对日军的袭扰，致使滕县、沛县、峄县的日军寸步难行。1941年春，日伪军不断对津浦、临枣铁路附近村庄进行“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按照鲁南军区的指示：鲁南支



1939年时的中共滕县县委

点。旋即他们又摸到炮楼后头，正准备挖墙，发现有两个现成的洞口。爬进去一看，十几个鬼子正围着桌子唧哩哇啦地吃东西。他们相互点了点头，将一捆手榴弹同时拉开弦，扔了进去，“轰”的一声巨响，屋内的鬼子被炸成了肉酱，在炮楼上站岗的那个鬼子被一枪毙命从炮楼上掉了下来。此次行动不足20分钟，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具、步枪8支、短枪一支，子弹800余发。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入侵临城日军人数增加到700余人，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朝鲜、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慰安妇当时在临城被称为“女子挺身队”，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被强迫来的军妓。当时的日军慰安所秘密设在临城大墙里，里面用木条、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条件极为简陋。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朝鲜青年妇女6名，她们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和任意蹂躏，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日军的暴打和虐待。

据兴仁村今年86岁的单厚恩讲，王延林有孤胆，为了夺取日军的枪支弹药，他在夜间偷袭临城伪军岗哨，截取日军步枪一支、手枪四支。不久他又和王玉莲两次夜闯临城日军大院，袭击日军慰安所。他们用洋镐挖开临城日军大院砖墙，在营房内截取

多里的长龙。两三个小时后，布匹大部分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这次行动共缴获棉布1200多匹、皮箱200件、日军军服800余套、缎子被100余床、显微镜4架，还有大量药品、呢料、毛毯等。这次战役品运往抱犊崮山区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还缓解了鲁南军区缺医少药的窘况。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联合抗日，并在全国实行全民动员。鲁南的地方武装也积极响应号召，以滕县爱国人士孔昭同为首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与国民党部队及守军协作抗敌。1940年11月孔昭同病逝，鲁南地方抗日武装改编为曲、泗、邹、滕、费五县联防大队，他的次子孔宪绍从抗大返回前线，接受了一一五师的任命，担任联防大队长职务，踏上了抗战的道路。1941年7月，滕县伪县长周侗蓄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并在滕县第五区向地方抗日武装进攻。我方武装因猝不及防，被其捕去地方工作同志五六人，俘去战士二三十人，缴去长短枪50多支，子弹5000余发，其他物资一批。这激起了抗日同胞的极大愤慨。此后，日伪军频繁扫荡，局部节节败退，最后不战而逃，从昭阳湖东逃到微山湖西沛县。周侗与国民党山东第十二专区取得联系后，蜷缩湖西，担任山东保安十四旅旅长。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也是山东抗日军民对敌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实行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用频繁的“扫荡”、大规模的“蚕食”和严密的封锁等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临城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之一，1942年春，峄县县委为保存抗日力量，报经鲁南军区批准，决定把鲁南支队部分主力调往夏镇西运河两岸与湖西抗日游击队策应，以养待战。王延林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带领队伍从津浦、临枣铁路两侧撤防到夏镇西的运河两岸。他们与湖西抗日游击队、运河支队配合，经常在微山湖西沛县大屯、安国、朱王庄及韩庄、微山岛、夏镇、付村一带活动。他们采取游击战术，经常东奔西走，出奇不意的偷袭日军驻地，骚扰杀敌。7月，王延林因天气湿热加之营养不良，腿部及腰部起了疥疮，但他强忍疼痛继续坚持斗争。一天，他带着两名队员去夏镇，侦察日军在夏镇的兵力和布防情况，准备对其实行偷袭，不料被驻扎张汪的滕县褚汉峰伪军发现告密。正当他们从夏镇侦查完敌情返到付村时，突然被日伪军包围，两名游击队员得以逃脱，王延林因身患疥疮，只身落入魔掌，不幸中弹身亡，时年39岁。

王玉莲得知这一噩耗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战友和家人来到付村，趁着夜色将王延林的遗体运到临山北麓埋葬。王延林牺牲后，全县上下哀思如潮，公开武装的指战员和隐蔽（地方）武装的广大游击队员，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而悲痛万分，同时他的英雄事迹大大鼓舞了鲁南抗战军民。全国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董一博在《鲁南抗日轶事录》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抗日英雄王延林，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壮乐章，树立了中华铁血男儿在日伪面前铁骨铮铮，不屈不挠的光辉形象。家乡的父老乡亲及党和政府将永远记住英雄的名字，并以英雄的事迹激励着为共和国献身的仁人志士。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任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的杜季伟来到兴仁村慰问革命战友王延林的家属，并到临山王延林的墓前敬献了花圈，缎带上书有“血洒微湖，英雄虎胆贯长虹；身卧临山，万古流芳慰忠魂”。当他发现墓碑上没有“烈士”二字时，遗憾地说：“延林哥是为抗日牺牲的，应该享受烈士待遇……”逝者已远，遗志犹存，杜季伟同志的肺腑之言表达了一位老战友对一位抗日英雄的深深缅怀之情。



王延林之孙王广德（右一）与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之子（左一）一起看望铁道游击队队员马世田

队要在临枣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大力开展对敌斗争，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打击敌伪军据点。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鲁南支队决定偷袭山家林火车站日军据点。

山家林车站位于临枣铁路的中心地段，驻扎着日军一个小分队，主要负责甘霖至匡山头的铁路安全，是临枣线上日军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这个据点的位置较高，铁路上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为了安全，日军在车站的四周挖了一道壕沟，壕沟岸上围一圈铁丝网，进出口必须通过吊桥。

1941年夏的一个夜晚，云隙里露出朦胧的月色，四野一片寂静。鲁南

支队的王玉莲和王延林带领10名队员带上长短枪和一捆手榴弹及两床棉被，向山家林车站逼近。他们顺着铁路间小道摸到鬼子据点附近的炮楼下，只见一个端枪的哨兵在炮楼上慢悠悠地来回走动，注视着远处的铁路。他们一行人悄悄地绕到炮楼下，把两床棉被往壕沟水面上一铺，静静地趟过了壕沟。再把湿漉漉的棉被搭到铁丝网上，俯踩着棉被进了据点。

曹德卿、李云生等人化装成群众溜进车站，藏在张允骥的家中。

到了晚上，列车驶入沙沟站，张允骥、曹德卿、李云生跃上火车，火车出站后，张允骥、李云生熟练地拔掉列车间的风管和挂钩销子，使车尾两节运布的闷罐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黄庄弯道处。

火车还没停稳，洪振海、杜季伟、孙茂生、马世田、王玉莲、王延林、王延斗及数十名群众一拥而上，撬开大锁，打开车门，大捆大捆的布匹往下撒，下边动员来的几百名群众你争我抢，有的抬，有的背，有的推，有的扛，异常紧张繁忙，刹那间，出现了从黄庄到微山湖畔郗山渡口十



发动群众破袭铁路



□记忆

周总理和朱启钤

秦绪颜

华光

上图是1957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来到北京东四八条朱启钤先生的住处，和朱先生畅叙时的一张老照片。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夔园，贵州开阳人，举人出身，著名的建筑学家、收藏家、实业家，曾任清朝政府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和津浦路督办等职，北洋政府时曾任交通部部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二十世纪初，八股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曾任总经理、董事会长、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长等职。

周总理和朱老先生可谓老友故交。这要从朱老先生的乘龙快婿以吴说起。

1913年，周恩来和章以吴都在南开中学就读，并且两人都是南开中学新剧团能扮演女角的业余演员（那时女角都由男生来演），章以吴在剧中扮演A女角。眼看就要公演了，恰在这时，章以吴父亲章以吴火速催其回京完婚，新娘便是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先生的二女儿朱淇筠。情急之下，导演只好让周恩来顶替章以吴的A角“救场”。由此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同窗情谊。之后，章以吴做了朱启钤的私人秘书，时常约周恩来在朱启钤家畅叙，一来二去，也使周恩来和朱老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不久，章以吴和朱淇筠为朱启钤生了个宝贝外孙，他就是建国前后跟随周总理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1949年国共和谈时，章士钊先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之一到京。章士钊与朱启钤和周恩来都是老朋友了，故周恩来见便问：“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先生，你我的老朋友朱（启钤）先生现在哪里，情形怎样，没去台湾吧？”章士钊便将朱启钤在上海寓居的情况如实相告，周总理当即授意行老给朱启钤写信，要他留在大陆，不要去台湾或香港。行老一连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往上海。朱启钤收信后，深感总理的拳拳深情，毅然留居上海。上海解放后，周总理即派章文晋将朱启钤一家接到北京定居。

回京后，朱启钤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热情，便联络中兴公司董事黎绍基、张叔诚、周叔廉等人，磋商复兴中兴轮船公司事宜。他仍被推举为董事长，并和大家一起决定召回滞留香港的18条轮船支援国家建设。经多方努力，除“中兴轮”暂留香港运营外，其余轮船悉数召回；接着，他又积极投入中兴煤矿公司的恢复重建工作。

1949年10月，朱启钤和黎绍基应邀参加了交通部召开的航务会议，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详细询问了中兴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的情况，称赞“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

周总理深知朱启钤学识渊博，理政有道。1905年，他便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1913年，他“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敢在皇城动手，改造紫禁城正阳门“治堵”，开通了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理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被美国公使芮恩斯称赞为“北京的奥斯曼男爵”；1929年，他邀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创建了“营造学社”，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鉴于他的学识和才干，总理推荐他担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古代建筑修正所顾问。20世纪50年代，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总理亲自征求朱老先生的意见，采纳了他所提出的3条宝贵建议。

周总理十分关心朱老先生的生活和健康。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总理来到东四八条朱老先生的住处，详细了解了他的饮食起居情况，问送给他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朱启钤说：“每天都拿给我看，就是有些字太小，没法看清楚。”总理说：“今后拿给你的文件用大号字印刷。”

总理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老先生知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立训练班时，当时他（周嘉琛）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总理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朱启钤因耳背经常打断总理的话，家人就摆手示意不要让他打断总理的话，总理微笑着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对葬俗改革有些保守，担心死后被火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火葬，想死后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家人忙又阻拦，总理又一次制止了他们，对着他戴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请你相信我，放心吧！”

多年的交往，使朱老先生深深佩服周总理的为人和领导艺术。他说：“总理是我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如果早生三十年，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就一定能办到。”

1961年朱老90岁生日时，总理送来个大花篮表示祝贺。几天后，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朱老举办了一次小型寿宴，并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朱老高兴地说：“好啊，那就请总理定日子吧！”

1961年12月7日，是总理约定好到朱家做客的日子。这天上午，因为总理要在一个大会上作报告，怕朱家人等得着急，就让邓颖超和章文晋、张颖夫妇先到。12点半，总理和孔原、童小鹏都来了。吃完饭，总理又陪朱老和家人谈话、合影留念。朱老特别高兴，后来他将手书的“松涛”二字幅亲自装裱送给总理以表感谢。

1964年初，朱老患感冒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总理正出访亚非各国，当接到中央统战部关于朱老病情的电报后，立即回电请北京医院全力救治。但终因朱老年迈病重，2月26日，不幸病逝。临终前，他还时时念叨着远在国外的周恩来总理。

1964年初，朱老患感冒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总理正出访亚非各国，当接到中央统战部关于朱老病情的电报后，立即回电请北京医院全力救治。但终因朱老年迈病重，2月26日，不幸病逝。临终前，他还时时念叨着远在国外的周恩来总理。